



航拍山海辉映的黄厝塔头村。

厦门塔头：海商聚落和亨万的传奇

□本报记者 林梓健 通讯员 颜素贞 文/图



林亨万画像

厦门岛环岛南路的黄厝塔头，是厦门最早的渔村聚落之一，也是厦门岛内最后一个闽南村落。

鲜为人知的是，塔头不仅是“厦门科举第一村”，还藏着海丝有关的传奇故事。史料记载，黄厝塔头是明末厦门海丝贸易的重要据点，参与了大航海时代环球贸易的丝路传奇，在中国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

随着塔头城中村现代化改造，塔头的传奇故事开始被发掘并广为人知。解元林奇石、进士林亨万、进士林翼池等曾经闻名遐迩的人物，诉说着海丝往事，叠藏着厦门城600年流变的传奇。如今，沿着塔头路芒果大道一路前行，塔头会客厅成为展示塔头文化的社区共享空间，塔头的故事也从这里重新开始。

海商聚落底蕴深厚

思明区滨海街道黄厝社区，现辖塔头、茂后、黄厝、溪头下、新村五个自然社。

黄厝历史悠久，可追溯至宋代以前。塔头城之名“塔头”，源于相邻的塔头村。旧时村落西边山间有七层石塔，时有群雁飞来栖息其上，故称“雁塔”，有“塔影雁阵”之美称，村落名字由此而来。

塔头背靠云顶岩，濒临厦门湾，远眺漳州河，扼守于鹭江航道出入口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早在600多年前，这里就建有厦门岛内的第一个防城——塔头巡检司城，是厦门岛内早期人文发祥地之一。

黄厝塔头自古以来书香氛围浓厚，人才辈出。自宋代起，涌现出多位进士、解元，如解元林奇石、进士林亨万、进士林翼池和武解元林培荣等。

塔头林氏一族，北宋时由晋江马平传入，自成聚落。黄厝社区辖区内塔头、茂后、黄厝、新村(草厝)等自然社的林姓均衍自塔头林姓，故统称塔头林。

塔头派林氏，源属九牧二房泉州刺史、岭南节度副使林藻(闽林十七世)后裔。在雁塔科第林氏大宗祠雁塔敬贤堂主厅，房梁上悬挂着许多刻有“进士”“解元”“举人”字样的牌匾。据林氏族谱记载，林励(闽林二十五世、锦马七世)自泉州晋江马平徙居嘉禾塔头，发展迅速，传至五世均庆公，创立雁塔派，灯(堂)号为“雁塔”，因世多科第荣名，后灯(堂)号遂为“雁塔科第”，衍传至今，枝繁叶茂。

据《厦门志》记载，有明一代，塔头林氏的科举之盛为厦门岛上一时之冠。到了明清两代，雁塔林氏更是人文蔚起，科甲联芳，是当时岛内进士解元“产量”最高的村庄，因此也被誉为厦门岛科甲第一村。

雁塔林氏以此为出发点，播衍广泛，近者在九龙江下游等周边地区，远者跨洋过海抵达台湾、东南亚等地。

塔头是一个拥有悠久海洋历史传统、浓郁海洋经济气息、厚重海洋文化底蕴的地方。这里耕地稀少，我们的先辈很早就以海为田，捕捞海货、贩洋经商、扬帆海外，这里堪称厦门岛内“海丝第一村”。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林氏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厦门雁塔林氏宗亲会会长林树山介绍，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明代进士林宗毅。

林宗毅，原名贲言，字允坤，号亨万，嘉禾屿(即厦门岛)人。亨万属闽林三十八世，雁塔十四世，少年时，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他立志报国，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中举，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初任江西浮梁，因擅长治理升任京官，并在短短几年内升至太常寺卿，后见朝廷日非，急流勇退。

在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林氏委员会秘书长林进才编写的《厦门湾往事：明末大海商亨万传奇》一书中提到，林亨万告老还乡后，为解决嘉禾屿人民的生计问题，主张开放“海禁”拓展海上贸易，通洋裕国。林亨万不辞年迈，亲自参与并推动海上贸易，以厦门湾为基地，通过与荷兰人在日本、中国台湾、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将中国的丝、瓷、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推向世界，带动了厦门港的早期兴起，是当之无愧的厦门“海丝”先驱。

林进才认为，林亨万便是在荷兰文献中出现的人物 Hambuan。

林亨万是不是 Hambuan?

然而，对于荷兰文献史料中记载的这位中国商人 Hambuan 的事迹，海峡两岸学者均有所探讨和研究，且观点不一。

台湾学者翁佳音先生在1999年发表的《十七世纪的福佬海商》一文中，初步考订出 Hambuan 为同安士绅林亨万，其名“亨万”(闽南话发音 Heng-ban)，恰巧与 Hambuan 的发音几近相符，两人应属同一人。

明代末叶的天启、崇祯年间，厦门港不仅已逐渐将漳州海澄月港取而代之，而且迅速成为当时福建乃至中国东南沿海重要对外贸易口岸。

金门料罗湾海战之后，中荷双方开始尝试恢复贸易关系。在荷兰档案文献中提到，1633年11月，海商郑芝龙派出的三艘帆船抵达大员(台南)，不仅搭载了荷兰人所需的货物，还给在大员的中国商人 Hambuan 捎来口信。在荷兰档案文献中，首次提到 Hambuan 的名字是在1631年4月。

1633年12月，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及评议会鉴于料罗湾海战的失利，认为凭借武力和强暴无法直接进行对华贸易，于是决定派遣在大员的重要商人 Hambuan 作为信使前往福建，与地方官府商谈恢复彼此间的贸易事宜。在 Hambuan 的努力斡旋之下，福建官府随即为三艘中国商船发放了前往大员贸易的特别许可，中荷之间的大员贸易由此得以重开并迅速恢复。

从1631年至1640年底的十年时间里，Hambuan 之名频频散见于《热兰遮城日志》(又称《台湾日记》)、《巴达维亚城日志》和《东印度事务报告》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文献之中。在荷兰文献的相关记载中，Hambuan 是一位来自厦门、在大员(台南)贸易颇有声望的重要商人，他时常往来于闽台海峡两岸之间，在荷兰人与明朝官府之间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协调，因此，荷兰人把 Hambuan 看作是他们最值得信赖和倚重的商人，而中国的朝野人士也对其所作所为颇为推崇和认可，从而使得其能够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内外局势下，为沟通和促进中外间的通商贸易往来、维护和争取中国海商的正当权益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对于 Hambuan 就是林亨万的猜想，学界也有不同声音。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桢认为，Hambuan 即林亨万之说仍有疑义。他指出，Hambuan 无疑是漳州港区大厦门湾一带的闽南人，他的籍贯并无记载，但有关林亨万的史料却十分翔实。

何乔远《闽书》卷九十一《英旧志》叙述同安县明朝科第，就有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年)举人林贲言(改宗毅)、四十四年丙辰(1616年)进士林宗毅的记载。从康熙版到民国版的《同安县志》里，都有林亨万的记载。

此外，《同安县志》卷二十八《人物录·乡贤》中的林亨万传记，略云：林宗毅，字允坤，号亨万，万历己酉(1609年)举人……丙辰(1616年)进士。初令浮梁……天启初以治刑入为兵科给事中，历户刑左右，进户科都给事……进太仆卿，擢太常寺卿。庄烈帝即位……升太常寺卿，疏乞终养，归书还淳二字于里闾，优游泉石者十余年，年七十卒……

杨国桢认为，对照 Hambuan 的经历，荷兰人从未提到他有当官的背景，反而多次提到他用金钱礼品贿赂官员的困难，连草莽出身的郑芝龙都不把他看在眼里。这与林亨万毫无相似之处。

2005年，翁佳音先生又发表了《十七世纪东亚大海商亨万(Hambuan)事迹初考》一文，进一步指明荷兰档案文献中不时出现的中国大商人“Hambuan”，应即中国文献记载的厦门士绅林宗毅。1640年底，亨万在台湾因海

难去世，标志着郑芝龙势力全面垄断东亚海贸，同时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贸易衰败的转折点。此观点得到海峡两岸学界的普遍认可，许多论著直接将 Hambuan 译为“亨万”。

翁佳音先生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亨万之事迹“虽稍有名目，但人名犹如谜一般，而且一直未被研究者深层钩沉、索隐”。

但对于 Hambuan 在沟通海峡两岸贸易及中荷交涉中的积极作用，杨国桢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从荷兰史料的分析中特别指出，Hambuan 是一位具有经商技巧和公关能力的明末自由商人的典型人物。

深耕海洋文化促发展

不论是告老还乡为家乡人民带来宝贵精神财富的林亨万，还是为沟通海峡两岸贸易及中荷交涉中起到积极作用的 Hambuan，都让塔头社与海洋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穿行于塔头街巷，拐进一条坡路，一段窄巷、一栋老宅、一片林地，一定别有天地，惊喜连连——它也许是塔头士绅林亨万的故居公祠，是“一百四十丈南北门二”的塔头老城城址的一点残墙石壁，抑或是匾额屡经修葺的雁塔科第林氏大宗祠敬贤堂……

如今，饱经风霜的亨万公祠，渐渐失去了它该有的容貌。

“亨万公祠作为雁塔林氏的精神堡垒和文化地标，需要及时地进行保护传承。”林进才说，为使塔头雁塔林氏良好家风家训和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有效传承，以及塔头海丝贸易的成果得以展示，他们希望能部分还原公祠原有的旧貌，并与现代建筑结合打造成为东亚大海商海丝纪念馆以及雁塔林氏家风家训及乡贤事迹展馆，并让它成为两岸根基文化交流的基地。

为让塔头的文化得以更好传承，林进才等林氏族人做了不少努力，比如目前已整理完成的《厦门湾往事：明末大海商亨万传奇》《黄厝社区历史与民俗文化概览》两本书籍，以及2021年10月，历经6年的雁塔科第林氏大宗谱成功圆谱等。

“以‘厦门海丝贸易第一村’和‘厦门科举第一村’为主题，接下来塔头将以塔头西路、中路两线雕塑小品和壁画以及先人成就的展示作为激励后人的载体，弘扬耕读传家的家风家训。”林进才介绍说。

对于塔头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厦门市闽南文化保护发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陈耕耕提出，塔头社在挖掘“海丝第一村”文化概念时，可围绕海商为引领的农耕文化，突出造船制造、航海技术等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可结合当地的石头房、番仔楼、闽南红砖大厝以及柴火灶烘干龙眼等传统工艺，讲好渔民村落故事，将海洋文化、海丝文化凸显出来。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王唯山建议，塔头社区在挖掘山海相连的旅游文化时，可以把知青楼、大队部、协德宫、当地传统民居等代表不同时代文化的建筑，以故事串联起来。

作为厦门市正在打造的第一批城中村样板示范村，黄厝社区如今正借助闽南IP，通过资源整合、文化引领，以“活化民俗”为主线，用“街区+社区”“共治+共享”的模式，服务在地人和旅行者“诗意地栖居”，让历史文化遗产融入市民群众日常生活。

今年初，“2024厦门思明山海艺术季”以 ART CITY WALK 的形式走进黄厝塔头站。“我们邀请全国各地不同维度的艺术家、文史专家、城市故事官、共创伙伴等，边走边看，亲身体验塔头的在地文化。”厦门思明山海艺术季总策划人苏晓东介绍，以艺术的形式赋能地方文化，将成为一种新的尝试和体验。

听海

闽海英豪 光耀千秋

□刘益清

沧海横流，百舸争流，千帆竞逐。海的尽头，是帆影；就像天的际涯，是美好的梦想。

每当伫立在福建的海岸，眺望海面上波诡云谲、帆樯穿梭，就不禁联想曾有多少英雄豪杰，在大海这个浩瀚的大舞台上，逐浪高蹈，纵横捭阖，追梦圆梦，为国家民族立下不朽功勋，为子孙后代奠定发展基业，他们的丰功伟绩，像璀璨星光，照耀千秋。

位于厦门岛东南部的塔头村，就是在儒家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双重熏陶下发展起来的海丝名村、人文古村。明清两代，雁塔林氏教育勃兴，科甲联芳，是当时岛内进士解元“产量”最高的村庄，因此也被誉为厦门岛科甲第一村。别称亨万的林宗毅，既是进士出身，又是海商大咖，见证并参与了大航海大贸易时代全球格局重构。林亨万退休回乡后不事农亩，亲自参与并推动海上贸易，以厦门湾为基地，通过与荷兰人在日本、中国台湾、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将中国的丝、瓷、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推向世界，带动了厦门港的早期兴起，被誉为厦门的“海丝先驱”。

从明末起，雁塔林氏从塔头出发，播衍广泛，远者跨洋过海抵达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抒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亨万是福建海商驰骋海上、向海图强的一个缩影。早在5000年前，福建先民就驾驶独木舟，奋力划桨，破浪驰骋向万里之外的南太平洋诸岛，考古证明，他们正是南岛语族人的祖先，是最早开发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群岛的族群之一。

岁月如水，缓缓前行。公元前202年，闽越国开国之主无诸，辟治山为冶城，跨江向海发展，成为东南海滨强国，享有国祚92年，为福建文明之勃兴、经济文化后来居上打下坚实基础。可以说，无诸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海洋意识和海洋眼光的政治家。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平定闽越国叛乱，徙闽越山民于江淮之地，福建的发展，一度人为中断。魏晋之际，天下大乱，北方士族纷纷南迁，给福建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闽江流域、晋江流域步入追赶发展期，紧挨着福建东部的海峡，让闽人的血脉里，很早就植入海洋的基因。向海图强，成为历代福建人生命的自觉，行动的必然选择。

7世纪，随着大一统的隋唐盛世到来，中国文明光芒四射，吸引海外各族。跨海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日益频繁，东南沿海地位不断跃升。

唐代，泉州跻身为全国四大贸易港口之一。宋元之际，刺桐港(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明代，九龙江口的漳州月港兴起，成为大航海时代中国的门户。

随着港口在全球贸易中跃居主导地位，来自沿海的先进分子，在世界舞台上日趋活跃。

14世纪30年代，大航海家汪大渊东装远游，来到福建泉州，青年时东装远游，来到泉州，被“海道所通、贾舶所聚、蕃商集居、杂货山积”的景象所吸引，产生要探访天涯海角的愿望。他两度从泉州港随商船远航，历经无数劫难，航程数万里，行前人未曾行，见前人未曾见，涉足220余个国家和地区。他撰写的重要航海著作《岛夷志》(又名《岛夷志略》)，极大拓展了中国人的国际知识和全球视野。

15世纪，从闽西漳平番寮村走来的王景弘，和郑和一道，指挥大明几百艘船舰，完成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极大拓宽了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海上通道。

16世纪，俞大猷抗倭，在纵横东南沿海十几年间，这位来自泉州乡间的民族英雄，和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又和谭纶、戚继光合称“抗倭三剑客”，为明代中期国家安全稳定作出不朽贡献。

17世纪，隐元东渡，成为日本黄檗宗祖师。自他之后，至少有十几位来自福建的高僧，肩负日本黄檗宗法脉传承的历史使命。在隐元东渡不久，另一位福建人，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大英雄郑成功，率八闽子弟，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收回台湾，成为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之后，施琅、甘国宝、林则徐、萨镇冰……一大批福建英雄豪杰，肩负国家使命，胸怀民族企盼，为促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战略安全，接续奋争无私奉献。他们是人民的英雄，民族的骄傲，时代浪潮上的佼佼者!他们的名字，必将世代流传，光耀千秋!



游客前往塔头知青楼参观。



雁塔敬贤堂主厅房梁上悬挂着刻有“进士”“解元”等字样的牌匾。



2024年思明山海艺术季走进黄厝塔头。